

許鈞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六編 第二冊

西周金文構形研究

陶曲勇 著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六 編

許 鏞 輝 主編

第 2 冊

西周金文構形研究

陶 曲 勇 著



T1621287

1621287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周金文構形研究／陶曲勇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136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六編；第 2 冊)

ISBN：978-986-322-657-4 (精裝)

1. 金文 2. 西周

802.08

103001861

ISBN-978-986-322-657-4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六 編 第二冊

ISBN：978-986-322-657-4

## 西周金文構形研究

作 者 陶曲勇

主 編 許鈞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六編 16 冊 (精裝) 新台幣 3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西周金文構形研究

陶曲勇 著

## 作者簡介

陶曲勇，1979年生，湖南祁陽人，講師。1997年至2001年，就讀於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2004年至2006年，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獲文學碩士學位。2006年至2009年，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字學、出土文獻研究。

## 提 要

金文在古文字研究中有著自己的特殊價值，它不僅歷經時代長，而且是當時的正體文字，代表著當時文字的主流，同時又具有客觀性，甚至唯一性的特點，是進行漢字構形系統分析，研究漢字發展史的可靠對象，本書在編撰《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的基礎上分析了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的基本特徵和實踐運用。

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的基本特徵可以分為構件和結構兩大方面。在構件方面，西周金文具有以下特徵：

一、形體上，西周早期金文的構件形體尚不固定，中晚期則漸趨統一。

在西周金文早期，漢字發展的主導思想基本還停留在象形階段，文字構造是直接以形體反映物象，這種以形表意的構形模式決定了構件形體的不固定。另一方面，西周早期的金文還是金文發展的初級階段，字形上仍不成熟，這也助長了構件形體的不固定。但這種構件的不固定是不符合文字發展規律的，最終必然要導致中晚期金文通過一定的手段對構件形體進行統一與固定。

二、功能上，西周早期金文的構件更多地注重表形，以形表意；而從中期開始，西周金文的構件逐漸分化發展為相對穩定的形符系統和聲符系統，分別承擔表意和表音功能。

西周早期金文繼承了甲骨文以形表意的主要構形模式，但也在積累著新興的形聲構形模式；到了中期，隨著社會的進步，語言的發展，形聲構形模式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逐漸分化出了一批相對穩定的形符系統來承擔表意功能。西周金文聲符系統的形成是與形符系統相對而言的。聲符系統由於自身的特殊性，它不需要專門調整出一批構件用於表音，從理論上講，任何一個成字構件都具備表音的條件和可能。

在結構方面，西周金文構形系統具有如下特徵：

一、單字構件數量多少不定，構件間的相互位置和方向也不固定。

西周金文系統的這一結構特徵是由以形表意的構形思想所決定的。西周金文構形的主導思想是通過文字形體直接反映客觀物象，而多種多樣、變動不居的客觀物象決定了直接反映物象的文字不會有一個穩定不變的字形結構。同時，西周沒有經過行政化的正字運動，文字的規範性、統一性都不強，這都導致了西周金文單字構件數量多少不定，構件間的相互位置和方向也不固定。

二、西周金文系統的構形結構從象形的平面組合為主逐步發展到表示音義的層次組合為主。

在文字發展的初級階段，文字構形的重要手段就是以形表意，以構件的形體直接表示物象的意義，這種圖畫式的組合方式自然就成了平面組合。而隨著文字的發展，偏旁意識的增強，尤其是形符系統和聲符系統逐漸形成以後，構字方式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不再直接表示客觀物象的形體，而是通過表示詞的音義來構成文字，這種結構上的重大調整就是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的第二個結構特徵。

在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的歷時演變方面，主要是單字構件的定形化發展和構形系統的形聲化發展。

單字構件的定形化演變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選擇式定形，二是改造式定形。所謂選擇式定形，就是在表示同一文字的眾多異體中，選用其中一個作為代表，用來統一這個文字在獨用或組字時的形體和結構。這是文字定形過程中一種相對簡單的形式。這種同化過程，多是將沒有區別作用的、代表相同意義的不同形體歸整為一個構件形體，其他形體則逐漸淘汰消亡。同化後的這些構件形體，與其說它們仍然表示著某一具體的客觀物象，不如說它們已經同化為一個代表符號，這是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的一個重大轉變。改造式定形，就是在文字的演變過程中，改變文字的原有形體，以原有字形為基礎改造出新的形體。如果說選擇式定形更多的著眼於選擇單字的形體，那麼改造式定形常常造成文字結構的改變。所謂改造式類化定形，就是指在改變字形的過程中，為表示同一類屬的文字選用構件時的類一化，這是改造式定形最突出的表現。

構形系統的形聲化演變方面，形聲構形方式已經發展為西周時期最重要、最能產的構形方式了。西周金文的形聲化方式有注形式、注聲式、改造式和形聲同取式四種，這其中，形聲同取式是形聲構形方式發展成熟的重要標誌，也是整個漢字構形模式發展成熟的重要標誌。

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的演變發展是服從整個漢字構形系統發展規律的，漢字構形的發展規律就是由直接以形表意、通過字形直接反映物象向以字記詞、通過記錄詞的音義來記錄語義的方向發展，這是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發展演變的內在動因。

《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共收集了西周金文已識單字 2584 個，其中異構字 572 個，論文窮盡性地分析了每一個異構字的構意，指出西周金文異構字的產生具有以下六種動機與目的：1、補足字義；2、分擔字義；3、加強系統性；4、優化文字結構；5、標示區別；6、消除訛變。總的來看，它的每一類現象都是有跡可循，每一類異構產生的目的都是符合西周金文文字系統的構形規律和構形思想的。



# 目

# 次

第1章 緒論	1
1.1 研究緣起與動機	1
1.2 研究方法與目的	4
1.2.1 研究角度與方法	4
1.2.2 研究目的	5
1.3 研究材料與整理	9
1.3.1 材料來源	9
1.3.2 整理原則	10
1.4 研究成果之綜述	11
1.4.1 西周金文構形的本體研究	11
1.4.2 西周金文構形的應用研究	14
第2章 西周金文構形系統基本特徵分析	17
2.1 構件特徵	18
2.2 結構特徵	25
2.3 小結	31
第3章 西周金文構形系統歷時演變論析	35
3.1 單字構件的定形化演變	36
3.1.1 選擇式同化定形	36
3.1.2 改造式類化定形	39
3.2 構形系統的形聲化發展	45
3.2.1 注形式	48
3.2.2 注聲式	51
3.2.3 改造式	52
3.2.4 形聲同取式	54
3.3 歷時演變的動因探討	55
3.4 小結	57
第4章 西周金文異構字研究	59
4.1 字樣的整理	59
4.1.1 字樣整理原則	59
4.1.2 字樣之間關係	60
4.2 異構字研究	61
4.2.1 異構構意分析	61
4.2.2 異構動因與目的	122
參考文獻	131

# 第 1 章 緒 論

## 1.1 研究緣起與動機

文字學上稱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爲金文，又稱銅器銘文，《禮記·祭統》有言：「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  
〔註 1〕又因鍾、鼎是青銅器中的大宗和代表，且多屬禮器，所以金文又稱鍾鼎文、吉金文字、彝器款識等。

從考古發掘可以知道，我國青銅器的製作有著悠久的歷史，從距今大約 4000～5000 年的甘肅東部馬家窯、齊家文化的遺址以及河北、河南、山西、山東的龍山文化的遺址和墓葬中，就出土了刀、斧、錐、鑿等青銅器具。在相當於夏代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和墓葬中，也發現有刀、戚等青銅器具。而大約從商代早中期開始，青銅器上就開始出現銘文，但這一時期的銘文字數不多，還較爲簡略。從商代後期開始，逐步出現一些較長的銅器銘文；而發展到了西周時期，由於冶煉技術的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特別是周人對禮樂文明的大力提倡，銅器銘文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開始進入鼎盛時期。據張再興先生統計，西周青銅器銘文數量占到整個青銅器銘文總數量的 42%，

---

〔註 1〕 孔穎達等，《禮記正義·祭統》，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1606 頁。

西周金文字數占到銘文總字數的 58%。<sup>〔註 2〕</sup> 直至春秋戰國以後，銅器製作始趨式微，相應的金文銘刻也逐漸衰落。

而對於金文的研究，早在北宋時期，就已經有學者開始致力於青銅器銘文的搜集、著錄。如呂大臨的《考古圖》、王楙的《嘯堂集古錄》、薛尚功的《歷代鍾鼎彝器款識法帖》等。到了清代，金文的著錄、研究已蔚為大觀，並開始走上科學研究的道路，湧現出阮元、吳式芬、劉心源、吳大澂、孫詒讓等著名學者。龔自珍在《說彝器》中曾指出：「凡古文，可以補許慎書之闕；其韻，可以補《雅》《頌》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氏族，可以補《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sup>〔註 3〕</sup> 很好地概括了金文的綜合價值。

但毋庸諱言，前代學者對金文的研究更多地著眼於它的史料價值。郭沫若先生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序文》中提到：「傳世兩周彝器，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sup>〔註 4〕</sup> 陳絜先生甚至概括說：「20 世紀的金文研究，其實就是一個金文材料史料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先秦古史重構過程」。<sup>〔註 5〕</sup> 目前的金文研究中，金文的史料化研究遠遠超過金文的文字學研究，儘管將二者截然分開也許不盡合理，但作為文字學的金文研究亟需加強卻是不容迴避的事實。

而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金文在古文字研究中有著自己的特殊價值。正如李學勤先生所概括的：「第一是時代長。青銅器上出現銘文，據現有材料，是在商文化的二里岡期，即商代早中期。……從商代到戰國有一千多年，文字形體有很大變化。其他古文字門類，如甲骨文主要是商代晚期，古璽、簡帛等只限於戰國以下，都沒有金文這樣長的時間跨度。」<sup>〔註 6〕</sup> 要研究古文字規律，要研究漢字發展史，就不可能避開金文這個門類。

其次，從金文的性質來看，它是當時的正體文字，代表著當時文字的主流。裘錫圭先生談到商代金文時曾指出：「我們可以把甲骨文看作當時的一種

〔註 2〕 張再興，《西周金文文字系統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2 頁。

〔註 3〕 轉引自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368 頁。

〔註 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年，第 9 頁。

〔註 5〕 陳絜，《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20 頁。

〔註 6〕 李學勤，《金文常用字典·序》，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 頁。

比較特殊的俗體字，而金文大體上可以看作當時的正體字。……是在比較鄭重的場合使用的正規字體。」〔註7〕儘管這種正、俗之名還可商榷，但青銅器作為禮樂重器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了其上的文字無疑是當時的通用文字代表；這些文字完全符合漢字發展史的研究要求，是研究漢字發展史的最佳對象。

第三，金文具有客觀性，甚至唯一性的特點，是字書材料所不能比擬的。金文一般來源於考古發掘的銅器實物，除少數偽器外，一筆一劃，都是古人真迹，反映了當時實用漢字的本來面貌，是研究漢字發展史的絕佳材料。王貴元師曾區分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字材料為兩大類：「歷史文字材料可依其存在形式的不同，分文本文字材料和字書文字材料兩大類。」〔註8〕在研究漢字發展史時，字書材料的缺陷十分明顯：「第一，字形失真。這些字書所收編的一般不是字的原形，而是經過隸定的楷書，因而無法進行歷史漢字構形的研究。第二，由於他們不是實用文字的窮盡整理，字形的收錄是否齊全無法查詢，特別是一些寫法或結構不同的字形變體，這些字書往往收錄不全，因而不但會失去一些研究字形演化和文字考釋的重要線索，而且缺乏統計的價值。第三，由於轉相抄錄，它們所搜集的字料往往是不同時代通過多種渠道積澱下來的，無法進行斷代研究。」〔註9〕只有出土材料中可以確定書寫時代的文本文字材料，才是進行漢字構形系統分析，研究漢字發展史的可靠對象，金文無疑符合這一要求。

而作為商周金文，甚至還具有唯一性的特點。李學勤先生曾提到「原史時期」(protohistory)一詞，用「以稱呼古代文獻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過或等於文獻材料的時期」；〔註10〕商周時期無疑就是這樣的「原史時期」，公認的、可信的傳世文獻尚且寥寥無幾，當時的手寫材料更是無處可尋，要研究這一時期的漢字發展史，以金文為代表的出土文字就成了唯一的依據與憑藉。

另一方面，從金文研究現狀的特點及不足來看，目前的研究中，單字考

〔註7〕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42~43頁。

〔註8〕 王貴元，《馬王堆帛書漢字構形系統研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頁。

〔註9〕 王貴元，《馬王堆帛書漢字構形系統研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頁。

〔註10〕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頁。

釋、銘文釋讀等方面都得到了深入發展，許多疑難字詞被釋讀出來；但理論探索、規律總結等工作則相對薄弱，許多研究仍然停留在以部分涵蓋全體、以個體推論一般的舉例式研究階段，這極不利於漢字理論的深入探討與古文字學科的現代建構。姚孝遂先生曾在《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一文中呼籲說：「在今天，我們對於甲骨文的研究，應該在其形體結構方面進一步深入地探討其自身的特徵和規律，不能局限於六書理論範圍之內和停留在偏旁分析的初步階段上面。這將廣泛地涉及到甲骨文形體的來源、結構規律、區別形式、孳乳變化過程以及與之相關的使用規律等諸多基本問題。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全面而深入地瞭解和掌握這一符號系統。」〔註 11〕儘管姚先生是針對甲骨文研究而言的，但將上述評論對象從甲骨文換作金文，這些觀點仍然是正確和深刻的。因此，對西周金文進行斷代的構形分析，為漢字發展史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就構成了本書寫作的緣起與動機。

## 1.2 研究方法與目的

### 1.2.1 研究角度與方法

任何研究都需要從一定的角度入手，不同的角度會用不同的方法，會有不同的側重。正如上文所述，在金文研究中，大的角度之分就有作為歷史學的金文研究和作為文字學的金文研究兩種；即使同是文字學的金文研究，也有靜態的單字考釋、銘文詮釋和動態的字形演化、字量比較等等不同，角度不一，多種多樣。本書則是從漢字發展史的角度對西周金文系統進行斷代研究，從漢字演變的動態角度對西周金文的構形進行探索分析。李孝定先生就曾指出：「研究文字學，不僅要在靜態方面分析其結構，也要在動態方面觀察其演變，就前者言，自西漢建立了完整的六書說理論，兩千年來，已有了豐碩的成果；至於動態的研究，雖然從東漢的許慎開始，就有了這種認識，但所據僅殘缺的史籀篇和經傳寫的古文經，時代既晚，數量也有限，《說文解字》一書的貢獻，絕大部分仍只限於前者；降至晚近，地不愛寶，金文、甲骨文、陶文，陸續有大量的發現，終使學術界對文字演變的研究，有了極好的憑藉，這是近世研究文字學

〔註 11〕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古文字研究》，2000 年第 20 輯。

的絕佳資源。」〔註12〕本書正希望從動態比較的角度，以出土金文材料為對象，研究漢字發展演變的歷史規律。

今天的古文字研究者都承認，漢字研究的主體應該是字形。要研究一個時期內漢字的發展演變情況，歸納出這一時期的變化規律，正確的方法就是羅列排比出這一時期所有漢字的形體演變過程，形成某一時期、某一類字的字形總表，觀察分析該表，並以同一個字的不同時期的前後對比、同一個字的不同系統的互相對比以及不同的文字系統之間的互相對比來歸納總結文字歷時演變的內在規律。同時，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以及古器物學的不斷進步，西周銅器都能做到大致分期，甚至歸於各王之世，為金文的具體分期提供了最便利的前提條件。因此，本書遵循窮盡性的科學分析原則，引入分期斷代的考古研究概念，將目前所見的全部西周金文依一定的順序製成《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在此基礎之上，對西周金文作斷代描寫與比較分析，探討這一時期文字系統的構形特點和演變規律。

### 1.2.2 研究目的

金文研究起源甚早，西漢武帝時就曾在汾陰掘獲一具銅鼎，但並無銘文，當時以為祥瑞之兆，漢武帝還以之薦於宗廟，並作《景星歌》紀念。到漢宣帝時，又在美陽發現銅鼎，獻於朝廷之後，群臣鼓吹倣仿武帝舊事，以之薦於宗廟，只有張敞反對。張敞根據鼎上的銘文指出，這是周朝一個叫尸臣的大臣受到王的賞賜，大臣子孫鑄鼎刻銘，紀其先功之物，不宜薦於宗廟。〔註13〕這是史書記載中最早的學者考釋金文之例，自此以後，金文研究歷代不絕。時至今日，金文研究早已涉及多個方面，無論釋字考史，還是月相曆譜，以及語法文例，都取得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

在這種背景之下，我們再回頭考察金文文字本身之研究，就會發現，金文研究的特點是大部分學者比較注重單字考釋，儘管這些考釋中多少會涉及到金文文字的構形問題，但其中多數仍然以六書的概念來處理文字的構形，這一方法雖然能夠說明金文中某一單字的結構如何，但是對於整個金文系統的發展演變，仍是比較模糊。可以說，從漢字構形學的角度來看，目前對於西周金文的

〔註12〕李孝定，《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第282頁。

〔註13〕事皆參見《漢書·郊祀志》。

構形問題還是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的。因此，本書研究的第一個目的就是以漢字構形學理論為指導，以西周時期的金文材料為研究對象，遵循窮盡性的科學分析原則，引入分期斷代的考古研究概念，通過對比研究，對西周金文作斷代描寫與比較分析，探討這一時期文字系統的構形特點和演變規律。

本書研究的第二個目的與第一個目的緊密相連。為了更好地研究西周金文構形系統，我們遵循窮盡性的科學分析原則，將目前所見的全部西周金文分期斷代，依一定的順序製成《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這一《字形表》既是我們研究西周金文構形的材料基礎，又是相對獨立的一部「西周金文文字編」，可以為今日古文字字書編纂工作提供一個新的成果，這就是本書研究的第二個目的。

具體說來，今日古文字學界還沒有一部有關西周金文的文字編，學者公認的權威金文字書當首推容庚先生的《金文編》。《金文編》是容庚先生所編著的一部有關商周金文形體的大型字書，從 1925 年印行出版初版《金文編》以來，至今已第四版了。容先生廣泛搜集商周彝器，考辨字頭，精心摹寫，依《說文解字》部首排列，《說文》所無而見於其他字書的字，或有形聲可識的字，都附列於各部之末，圖形文字不可識的列為附錄上，有形聲而不可識的列為附錄下，書後附《採用彝器目錄》及《引用書目》，並附筆畫檢字，便於檢索。全書彙集商周歷代之銘文，展現金文形體之變遷，考釋精審，體例合理，已經成為研究金文最具權威性的工具書，成為治古文字學者案頭的必備之作。

既然容庚先生的《金文編》已經包括西周金文形體，而且已成權威，可謂是珠玉在前，為何還要另製「西周金文文字編」、編纂《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呢？這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這一工作的必要性與價值。

一、《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將對迄今為止的所有西周金文字形作窮盡性的搜羅，準確反映目前西周金文資料的實際。四版《金文編》的完成、出版早在 1985 年，而時至今日，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突飛猛進，新的金文資料日益增加，《金文編》的收字已經遠遠落後於目前金文資料的實際。以《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註 14〕一書為例，此書搜羅了至 2005 年止，新出及《殷周金文集成》漏收的銘文銅器就已達 2005 件。著名金文學者張亞初先

〔註 14〕鍾柏生、黃銘崇、陳昭容、袁國華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 年。

生早已指出：「目前所見金文單字總數，包括新發表而《殷周金文集成》沒來得及收錄的新器銘文，如果用《集成引得》所收單字總數 4924 加減 50 來表示，應是大體符合當前的實際情況的。故金文單字總數大約在五千上下。過去我曾對《金文編》所收單字做過統計，正編收 2333 個，附錄收 889 個，二者合計為 3222 個，放寬點看，總數不超過 3300 個，《集成引得》所收單字數 4924，與 3222 或 3300 相比，顯然已不可同日而語了，大約增多了三分之一。這個數字是驚人的，這樣看來，《金文編》的再增訂已經是刻不容緩了。」〔註15〕目前距張亞初先生的統計又過去了十年，單以正編收字而言，嚴志斌先生的《四版〈金文編〉校補》就增收了 775 個字頭，將近《金文編》正編字頭的三分之一，《金文編》反映金文現實的滯後可想而知了。儘管上述對比是就整個金文資料而言，但西周金文是金文資料的大宗，據此也可以反映編纂《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的緊迫性與必要性了。

此外，《金文編》的體例是字頭下一般只選取代表性的形體及該字異體，既滿足了釋字的實際需要，又壓縮了全書的整體篇幅，確實能滿足金文研究的絕大多數需要。但漢字發展史要求的是研究者窮盡性地佔有現有資料，只有這樣才能盡量避免研究結果的偏差與錯誤。所以《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以《殷周金文集成》（增補修訂本）和《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為資料基礎，對截止 2005 年的所有西周金文字頭作窮盡性地辨認和收錄，堪稱目前搜集西周金文形體最為完備的字書，以滿足漢字發展史的研究要求。

二、《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借鑒銅器斷代分期的研究成果，盡可能地對每一個金文進行斷代分期，將金文形體作歷時性地排比羅列，最直觀地反映了文字形體的歷史變遷。

銅器的斷代分期是青銅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尤其是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銅器年代學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據悉《殷周金文集成》編纂之初也曾設想為每一件銅器斷代分期，但由於種種原因，最後未能實現；但後續的青銅器著錄工具書都無一例外地引入了斷代分期的做法。如《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將所錄銅器分為九期，即：商代前期（前 1600～前 1300）、

〔註15〕張亞初，《金文考證舉例》，《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

商代後期（前 1300～前 027）、西周早期（前 1027～前 966）、西周中期（前 966～前 865）、西周晚期（前 865～前 771）、春秋前期（前 771～前 652）、春秋後期（前 652～前 475）、戰國前期（前 476～前 369）、戰國後期（前 369～前 221）；《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也有類似的編排。這些斷代分期的成果使得確立每個金文的時代和國別成爲可能。

漢字發展史要求通過排比每一個文字的歷史變遷軌迹來研究文字的發展演變規律。而四版《金文編》在這一方面無疑是遠遠不夠的，其羅列的字形排列順序較爲雜亂。而金文作爲延續時代最長的一種古文字資料，按其發展的時間順序加以排列對比，進而考察其演變規律與發展歷史是完全可能和很有意義的。《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的這一做法開創了金文字書編纂的先河，不僅有利於金文的考釋與研究，而且對於整個漢字發展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三、《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適應古文字研究的發展要求，引入古文字資料數字化電子處理系統，對四版《金文編》做了一系列技術手段的更新，以便更好地服務於漢字發展史的研究工作。

首先，《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以電腦拓片取代舊式的手寫摹本，能夠更準確、更客觀地反映字形實際。受制於技術手段的缺乏，歷來的古文字字書都以手寫摹本爲主，雖然能清晰地反映字形結構，但必須指出的是這是一種主觀行爲，常常伴隨著臨摹者自己對字形的理解，失真、失實的情況屢有發生。容庚先生的《金文編》歷來被譽爲摹寫精審，容先生又是金文大家，但即使這樣仍然不能避免留下遺憾，全書中誤摹的情形可以參看金國泰先生的《〈金文編〉讀校瑣記》一文。〔註 16〕

1994 年，王貴元師首次在其博士學位論文《馬王堆帛書漢字構形系統研究》中引入電腦剪切拓片技術，製作了《馬王堆帛書字形表》，這是古文字字書編撰中的一大創見，此後的相關研究中，採用拓片形式已經成爲了學術界的主流，如李守奎《楚文字編》、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等均是如此。

《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正是適應這一要求，以電腦拓片的剪切代替手工模式的摹寫，保留了金文的原始客觀形體，便於研究者的考釋辨認，具有十分

〔註 16〕 金國泰，《〈金文編〉讀校瑣記》，北京，中華書局，《古文字研究》2000 年第 22 輯。

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其次，《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改變了四版《金文編》異體字不出字頭的體例，在主字頭的下面，對字形異體加以隸定，列出異體字字頭。異體眾多，是金文的一大特點；而異體字對疑難字的考釋和辨析字形的結構特點都很有意義。爲了更好地研究一字異形現象，研究漢字的定形與分化，許多古文字字書都詳細列出了異體字的字頭，如廣受學界讚譽的李守奎先生的《楚文字編》〔註 17〕就是如此編排。因此，《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廣泛吸取學界的先進成果，對字書做了更合理的處理。〔註 18〕

總而言之，本書的研究目的就是在編纂「西周金文文字編」——《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的基礎上，對西周金文作斷代描寫與比較分析，探討這一時期文字系統的構形特點和演變規律。

## 1.3 研究材料與整理

### 1.3.1 材料來源

1984 年至 1994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是目前著錄金文材料的集大成之作，全書共收青銅器 11984 件，器物類型 51 種，收錄年份截止 1984 年；2007 年又出版了該書的「修訂增補本」。

《殷周金文集成》出版之後，又有許多考古成果發表，《集成》不及收錄。有鑒於此，臺灣鍾柏生教授領銜主編了《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從近百種期刊、專書、拍賣行圖錄中揀選出有銘銅器，收錄銘文拓片、銅器器影、器形線圖、紋飾拓片，收錄年份下限至 2005 年，共 2005 件有銘銅器，器名、釋文皆逐一審閱考訂，並附有器類字數、族名、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方便使用。上述兩套大型叢書基本彙集了目前所能見到的銅器銘文。

在古文字資料電子化方面，則有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開發、廣西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商周金文數字化處理系統》，其中的《金文資料庫》以《殷周金文集成》爲基礎，收錄青銅器 12231 件，並實現了器物

〔註 17〕 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註 18〕 因篇幅所限，《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暫不收入本書。此字表已併入王貴元師所編《新編金文編》，可以參看。

種類、器物名稱、著錄、時代、國別、字詞等方面的查詢與檢索，還配套出版了《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和《金文引得》（春秋戰國卷）。儘管這一數字化處理系統還存在許多問題，如「同銘」材料的鑒別與處理、近出重要銅器銘文的漏收、個別銘文的隸定與釋讀等方面都不乏可以商榷之處，〔註 19〕但是從使用方便的角度來看，尤其是對於需要進行文字檢索、處理大量銘文拓片的研究者來說，這個系統還是十分便利的。

正是基於以上考慮和可操作性的原則，本書以《金文資料庫》為基礎，參考《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和《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兩書，從中選出屬於西周時期的銘文材料作為研究對象。

### 1.3.2 整理原則

本書材料整理原則如下：

（1）研究對象為西周金文材料，時間範圍嚴格限定在西周時期，對於一部分斷代模糊或目前尚無定論的金文材料，暫不作為研究對象。具體說來，那些定為「殷或西周」以及「西周或春秋」的銅器銘文暫不進入研究範圍。

同時，根據陳夢家先生銅器斷代三分法體系，將所有銅器銘文相應分為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部分斷代有分歧的材料，主要參考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三位先生的《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註 20〕目前還無法斷代分期的則列入「西周」一欄，以便於進行歷時比較研究。

（2）所收字形均以銘文拓片為準，摹本字形暫不收錄。必須承認的是，許多缺乏銘文拓片的傳世摹本在金文研究中具有重大意義，曾起過巨大作用，不能輕易忽視它們；但也應該指出的是，這些傳世摹本的可信度大大低於銘文拓片。以禹鼎（《集成》2833）為例，傳世的宋人摹本（《集成》2834）文多殘泐，而且錯誤歧出，難以卒讀。如果沒有後出的銘文拓片對比，徑以摹本字形作為研究材料，那麼研究結果的偏差性就難以避免了。考慮到並不是每一張傳世摹本都有拓片可以對比，所以本書對摹本字形暫不收錄。

〔註 19〕參看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第六章第三節點評，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年。

〔註 20〕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